

中医科学必须彻底告别“余云岫现象”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ust Break Away from “Yu Yunxiu Phenomenon”

柳秉理

(中国中医药学会 北京 100029)

20 世纪是西方文化与科学在中国广泛传播、迅速发展的 100 年,也是中医药学(以下简称中医)面对挑战、在逆境中艰难前进的 100 年。早在本世纪 10 年代,以余云岫为代表的一些接受了西方科学和西方医学的人即公开提出废止中医的主张。尽管从当时起,余云岫的思想观点及余云岫其人其事已历经国人反复批判,但是,许多不断改头换面、重新包装的“余云岫现象”,始终若即若离、时急时徐地干扰着中医的健康发展。在人类即将进入 21 世纪之际,有必要对其变化的脉络加以剖析。

余云岫(1879~1954 年),早年在海外学习西医回国后,即对中医持有顽固的偏见。1917 年其出版的《灵素商兑》一书,完全从西医的角度出发,全盘否定中医《灵枢》、《素问》的医学观念和基础理论。他完全回避中医概念、范畴体系独特的科学内涵,主观认为:中医是落后的“封建医”,既不符合现代西医的标准,也没有可信的理论;其治疗技术和方法上也是落后的、经验性的,与科学的西医相比,应当消灭、废止。1929 年,在当年“南京政府”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余云岫提出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当时,他的做法遭到中医界和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废止中医案”终未得通过。

1950 年,余云岫在出席建国初期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期间,改换包装,老调重弹,提出了一个“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他藏起了当年曾欲“废止”的图谋,但仍顽固坚持否定中医科学性的态度,从基础理论入手,对中医搞所谓“堕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他主张用西医基础医学的课目考试中医,计划用 40 年时间完成对中医的改造,达到“淘汰多数,保留少数,加以改造,变为医助”的目的。遗憾的是,这一“改造草案”竟然在会议上通过了。他解放前的目的未达到,解放后却达到了。50 年代初,原卫生部主要负责人王斌、贺诚所大力推行的“中医科学化”,与余云岫的“改造草案”实同出一辙。其主要做法也是要求执业的中医师必须学习西医的生理、解

剖、病理、微生物、寄生虫、药理等课程,并通过考试,“改造”合格,方可从业行医。

众所周知,科学是技术的基础,临床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不承认中医的基础理论,就等于把中医退回到《黄帝内经》之前的水平;实现了“中医科学化”,就等于使中医丢掉独特的医学科学体系,蜕变为从属于西医的一种治疗方法。所以,由余云岫倡导的,由王、贺推行的“中医科学化”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消灭汉医的做法完全一样,是在堂而皇之的口号下对中医作断根绝源的扼杀。(此事后在毛泽东的过问下,以王、贺被撤销卫生部领导职务收场)

对于 50 年代初的“中医科学化”的这一幕,当时主要是从行政的角度上把它作为歧视、排斥中医的问题来看待、处理的。这种看法固然没有错,但并未抓住问题的本质。其实,把中医“改造”成西医的“中医科学化”,是独尊分析性科学、无视综合性科学的结果;是一种“科学对科学的误解、文化对文化的摧残”。所以,若不尊重中医自身的科学规律,不承认中医与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即使采取严厉的行政撤职手段,也难以避免类似问题的重演。后来的历史事实表明,毛泽东尽管严肃地批评和处理了当时的卫生行政部门,但在以后的关于中医的实际方针问题上,毛泽东本人也仍然陷入迷途。

1958 年,以毛泽东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和当时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社论为基础,铸成了困扰中医发展长达 40 年之久的一个悖论。这个悖论的核心是:既承认中医是科学的,又将中医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寄托在西医学学术身上。其症结在于:中医既然是科学的,为什么不能按照自身的科学规律,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呢?表面上看,毛泽东的批示与王斌、贺诚等的观点不同。实际上,后者要求中医人员通过学习西医基础理论,使中医西医化;前者要求西医人员学习一点中医,进而用西医基础理论的标准改造中医。这

虽然不算是“朝三暮四”的游戏,但两者却本同而形异、殊途而同归,最终都将使中医的基础理论被彻底丢掉。应当肯定,当初毛是出于对中医的保护,但因为不懂中医的科学原理,也不懂中、西医的真正区别,所以按照他的指示所办的仍然是余云岫当初想要办的事。

40年来,毛泽东这一悖论渗透到中医医疗、教学、科研、管理的各个方面,它使所谓的“中医科学化”以及“中医西医化”的“余云岫现象”,理直气壮地变为中医学学术发展和事业管理的基本格局,并从体制上固定下来。由此造成的混乱与危害,是难以估量的。要破除这一悖论,阻断所谓改造中医的进程,当前面临着两大难题:第一,必须冲破“凡是”论这一政治上的难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年了,在中医药工作上的“凡是”论问题至今仍未提到拨乱反正的日程上来。“中医西医化”的“余云岫现象”不破除,中医的医疗、教学、科研、管理就迈不开改革、开放的大步伐。第二,必须从文化科学多元的立场出发,从学术上彻底阐明中医区别于西医的科学原理,使中医和西医在医学科学上真正处于“并重”和“同等重要的地位”。80年代以来,中医界和其它自然、社会科学界已经围绕第二个问题做了大量的学术准备。由于

(上接第11页)

的自然科学内容,在研究中如果把非自然科学内容当成自然科学内容加以研究,就走入了经络研究的误区。

不仅经络理论,中医学基本理论无不留有当时人文观念的痕迹^[14]。中医理论是以特殊的人文文化形态反映人体科学的医学体系。具体地说,中医理论研究方法的特点,是将所见到的人体现象与自然万物的基本结构和运动规律作为对照而进行思辨;它的理论表述是自然语言方式的逻辑推导,不是以实验数据为依据的实证说明^[15]。中医病理学中对许多生理病理现象所作的解释,也不是以事实观察为基础,而是将自然哲学原理作为直接推理和解释的工具^[13],因此就自然会出现脱离临床的理论推导,在推导中产生的一系列经脉理论就可能与早期的对血液循环、神经的朴素认识所反应出的本质出现明显的距离,其产生误导是在所难免的。经络现代化研究成效不显,以及发生许许多多的争论和困惑的重要原因在于对中医的基本性质缺乏一种应有的共识。这种共识是:中医是一种以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方法来体现科学精神的经验知识体系^[16]。尽管经络理论中的科学成分与人文成分的交织状况使其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但从医学角度研究经络切不可混淆两种文化的界限,以免造成中医科研工作的盲目和混乱^[15]。在经络研究中,应遵守普遍的科学标准,经络研究才有希望,中医针灸才能得以切实发展。

参 考 文 献

“凡是”论的干扰,学术发展一直徘徊不前。只有从政治上彻底冲破“凡是”的禁锢,才有利于大家在宽松的学术环境里全面揭开“悖论”的错误和危害,在思想认识上彻底与“余云岫现象”告别。这是新世纪中医避不开、绕不过的首要任务。

需要指出的是,在今天,“余云岫”们不再是狂呼“废止中医”,而是既称赞中医是科学的,同时又把“中医西医化”当做“中医现代化”任务。这一历史阶段的“余云岫”并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坚持用西医的观念与标准对中医进行验证、解释、改造的一种社会现象。一切肩负着振兴中医使命的当代学人,都应以科学的态度,透过现象,认清本质,这样,余云岫现象就将难以存在。

自从有了中华民族,就有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自从有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就有了中华民族自己的中医学。先辈们用他们的艰苦努力和聪明才智为我们创造的中医,决不当消亡。当西医已走入徘徊不前的“平台”,正把防病治病的眼光投向中医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视野封闭在用西医来改造中医的误区之中呢!

而今,令人倍感担忧的,仍然是困扰中医发展长达100年的“余云岫现象”!(责任编辑 蔡德诚)

- [1] 李瑞午. 中国针灸学会经络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工作总结(摘要). 针灸简讯,1999(2)
- [2] 黄龙祥. 金针之魂.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
- [3] 孟庆云. 试论经络学说之起源和发展. 黑龙江中医药,1985(5)
- [4] 孟昭威. 经络学说的起源形成及其展望. 中国针灸,1982(5)
- [5] 贾得道. 论中医经脉的实质. 山西中医,1995(6)
- [6] 黄龙祥. 经络学说的由来. 中国针灸,1993(5)
- [7] 何宗禹. 马王堆古医书中经络针灸研究资料探讨. 中华医史杂志,1980(2)
- [8] 姚纯发. 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初探. 中华医史杂志,1982(3)
- [9] 蒋永光. 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危机的思考. 医学与哲学,1998(10)
- [10] 何宗禹. 马王堆医书中有关经络问题的研究. 中国针灸,1982(5)
- [11] 刘澄中. 再论中国经络现象研究的沉寂与出新. 医学与哲学,1993(12)
- [12] 刘精微. 经络学说的起源及经络实质之我见. 中国针灸,1982(5)
- [13] 朱兵. 针灸的科学基础. 青岛出版社,1998
- [14] 杜建. 中医学研究的突破口之我见. 转引陈可冀主编,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的理性思考. 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
- [15] 常存库.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 医学与哲学,1996(1)
- [16] 邱鸿钟. 论中医的科学精神和人文方法. 医学与哲学,1999(1)

(责任编辑 蔡德诚)